



VISITING SCHOLARS' WORKING PAPERS

陳映真《萬商帝君》的宗教性
——基督教話語的折射與世俗化

白永吉

高麗大學

Submitted 2017

Papers included in the CCS Visiting Scholars' Working Papers are preliminary works or works in progress. Without being formally reviewed or formatted, they are intended to encourage feedback and further discussion. Please do not quote or cite without authors' permission.

陳映真《萬商帝君》的宗教性

——基督教話語的折射與世俗化

白永吉（高麗大學）

〈摘要〉對陳映真的小說裏貫穿始終的主題，例如向不幸的鄰居們的共同體意識和愛中含有的左翼政治理念，同時超越這種現實歷史的框架來直面人的靈魂的，一種與生命意義的探索有關的基督教宗教性的探討，就是深入理解陳映真文學思想的關鍵詞。只是，這種以人道主義為媒介的“陳映真宗教思想的特點”有可能也成為他的文學世界中基督教的宗教性體現過程上的某種局限或特殊情況的因素。陳映真小說創作中一個位於分水嶺位置上的中篇小說《萬商帝君》，就是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此，將《萬商帝君》的基本主題闡釋為對以跨國企業為代表的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結構性批判的話，這部作品可說是把“前路封死”的，“全無出路”的一種悲劇性作品。但是，從這部作品中含有的宗教性的潛在意義的方面來看，這部作品的這種悲慘的結局也可以闡釋為一種向真正的基督教拯救意識體現的萌芽性陣痛。總的來說，《萬商帝君》是用“曲扭的鏡子”映照著臺灣的現實，體現基督教話語的折射和世俗化的重要成果。

1. 序言：“基督教信仰與社會主義信念”的問題

陳映真（1937-2016）不僅是當代臺灣文學界具代表性的作家，也是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包括大陸和華語世界在內的現代中國文學界一直矚目的文學家。而且，他的文學活動除了以小說為中心的散文、評論、報告文學等的創作之外，還涉及到發行雜誌以及社會批評等多方面內容。因此，僅限于小說體裁來回顧他的文學世界，很有可能會停留在有限的視野之內。盡管如此，他的小說裏隱藏的對歷史現實的積極參與精神和滿懷激情的人間愛，以及細膩含蓄的抒情文體，都是將他作為“真正的藝術家”¹定位的核心要素。其中，他的小說裏貫穿始終的主題，例如向不幸的鄰居們的相關意識和愛中含有的左翼政治理念，同時超越這種現實歷史的框架來直面人的靈魂的，一種與生命意義的探索有關的基督教宗教性的探討，就是深入理解陳映真文學思想的關鍵詞。

在陳映真的小說中，集中體現基督教宗教性的是他初期創作的小說。這個時期的作品中出現的知識分子主人公的內心苦惱和虛無意識裏隱含的宗教性懺悔意識，就是與對歷史現實矛盾的抵抗意識，貫串著陳映真文學世界的兩個圓形結構。如此來看，在關於陳映真文學的現有研究中，將陳映真初期文學的特徵闡釋為“基督教信仰與社會主義信念之間的思想的、

¹ 姚一葦，〈姚序〉，《我的弟弟康雄：陳映真小說集1》（洪範書店，2001年版）。

情感的張力與糾葛”²之結構的趙剛的觀點，可以說是值得注目的批評。尤其在這種分析的框架中引人注目的是，作為使陳映真小說所表現出來的“左翼思想”能成為比馬克思主義更具有多層次意義的“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核心要素之一，舉出“與基督教(尤其是解放神學)的深入對話”的這一點。³

盡管如此，眾所周知，以人道主義為媒介的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和基督教的和諧，這種觀點不僅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和否定，在基督教的圍繞著宗教本質的神聖性範疇裏，也會引起不少的爭論和批判。因此，在關涉到陳映真文學中有關馬克思和基督教的關係，趙剛也提出了如下值得關注的意見。

可以說，“耶穌”與“馬克思”，對於青年陳映真而言，一直是兩個並不衝突可以並行不悖的追求正義、平等與解放的理想形象，都是他的“鞭子和提燈”。

——中略——

懷著極真誠的仰慕看著耶穌，但同時又極真情地同情著魔鬼……，是陳映真宗教思想的特點。而這個特點，用另一種表達，即是陳映真在基督教與左翼之間的掙扎。他在兩個愛人之間被撕裂，他的思想是這個撕裂的城市表達。⁴

在此，對“耶穌”和“馬克思”或“魔鬼”形象的相提並論，以及獨特的邏輯展開的適當性與否的討論暫且不提。只是，這種“陳映真宗教思想的特點”有可能也成為他的文學世界中基督教的宗教性不能更深入地得到體現的一定限制因素。這種特點與限制不僅是他早期小說的局限，而且可能牽涉到他的整個創作生涯上的特性。在小論的本文裏要探討的他的中篇小說《萬商帝君》就是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首先，從基督教宗教性的角度來看，這篇《萬商帝君》創作於陳映真小說創作的初期和後期之間，是一個位於分水嶺位置上的作品。

這篇小說作為陳映真的所謂“華盛頓大樓”四部作中最後一部作品，其基本梗概是：一個叫林德旺的農村出身的年輕人在臺北的一個美國跨國企業裏，雖然為了“成功”和“出世”竭盡全力，但在激烈的競爭社會中被疏隔、淘汰以後，最終發瘋的故事。這部作品的基本主題是對以跨國企業為代表的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結構性批判意識。同時，作為對這種跨國資本主義近代化的批判性抵抗話語而提出的，就是作為社會主義或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理念的“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精神。其中，關涉到這種主題意識而暗示的，就是基督教的“解放神學”話語。因此，趙剛在對陳映真初期小說的“宗教與左翼主體的道德維度”之分析框架的延長線上，將這部小說闡釋為與對臺灣現實“體制教會”的愛憎以及與第三世界“解放神學”論的實踐課題相關的，“抵抗主體的問題意識與信念上失重而落”的悲劇性作品。⁵

² 趙剛，《左眼臺灣：重讀陳映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5頁以及趙剛，〈青年陳映真：對性、宗教與左翼的反思〉，《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新竹交通大學，2009. 11），59頁。另外，關於陳映真的小說創作分期，小論也參照趙剛的觀點，即早期（寓言時期：1959-1965），中期（社會批判時期：1966-1982），晚期（歷史時期：1983-2001）。參見 趙剛，《左眼臺灣：重讀陳映真》，6頁。

³ 與此有關的趙剛的評論中，精彩的部分是，關於陳映真初期小說的“左翼男性”主人公們如何通過“和女性、和生活、和人民和解與學習”的“自我改變”來追求“革命的實踐”，這種問題的論述。他指出這樣的人物形象的創造就是，馬克思所提出的“一種對於生活、生命、他人的熱愛應該是革命實踐的前提與同時存在物”的，真正的“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的體現結果。參見趙剛，〈青年陳映真：對性、宗教與左翼的反思〉，前揭，5，39頁以及《左眼臺灣：重讀陳映真》60，108頁。

⁴ 參見趙剛，〈青年陳映真：對性、宗教與左翼的反思〉，前揭，120，124頁。

⁵ 參見趙剛，〈青年陳映真：對性、宗教與左翼的反思〉，前揭，118-120頁以及《左眼臺灣：重讀陳映真》，前揭，160頁。只是評論界對這部作品的評價不那麼好。例如說，在一篇評論上呂正惠指出說：“《萬商帝君》的缺陷非常多，其中之一就是：太像經濟論文而不像小說。這是陳最大的‘悲劇’。這

本論文也基本上同意這種分析的主要論點，但從這部作品中含有的宗教性的意義分析方面來看，這部作品中悲慘的結局應該闡釋為體現一種向基督教拯救意識的指向性及其超越性的結果。尤其是，這種觀點就是通過對“社會主義信念和基督教信仰”的，陳映真文學的批評框架正當性的批判性再探討，來重新對臺灣當代文學裏體現的基督教話語的特徵和意義展開更深入探索的一個環節。爲了這種論點的具體論述，以下試圖探討作品中出現的主要人物形象的性格分析及其宗教性體現的意義闡釋。

2. “貧窮的鄰人”和全球資本主義

首先《萬商帝君》的主要矛盾結構是以美國跨國公司臺灣莫飛穆 (Moffitt & Moore) 的公司內部，圍繞企業經營方針的實務本土管理型外省人出身陳家齊和美國式管理型本省人劉福金兩個派系間的矛盾為中心展開的。這部作品的主題可以說是針對由全球資本主義進行的臺灣近代化現象的批判。因此，該作品的主人公林德旺的悲劇性毀滅，也可解釋為象徵著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追求物質性豐饒生活的人性破滅現象以及臺灣傳統社會和農村經濟的崩潰。另一方面，這部作品中出現的人物，有爲了照料弟弟犧牲自己的青春，在家鄉的民間信仰道教寺院裏穿着女道士的衣服以占卜為主業的姊姊素香，還有在公司裏擔當祕書工作、給林德旺溫暖之心情，時常要給他傳福音的虔誠的基督教徒Rita。此外，在作品中沒有直接出現的Rita的女子高中同學，現在可能在南美當修女的瓊，也以回憶方式體現著與宗教性話語相關的象徵意義。

在此，如果《萬商帝君》裏也呈現出陳映真文學的“基督教信仰和社會主義信念”之間的張力或糾葛的話，那麼其最核心的切入點就是“貧窮”。其中，首先在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貧窮”概念及其目標的基礎是物質貧困和階級矛盾的克服。與此相比，在基督教的“貧窮的鄰居”範疇和“愛人”的課題是“愛主你的上帝，愛人如己”的，是給人頒佈的神之誡命，也是給遵守那種律法的百姓被神賜予的拯救的承諾。⁶因此，基督教的聖經所言的“窮人”的概念並不侷限於現世的物質價值與階級矛盾的結構。⁷與此同時，那個“愛人”也以“上帝對人的愛”為基礎，因此“《聖經》中的‘愛’的涵義逐步從具體轉為抽象，從人間過渡到天堂。”尤其是在《新約》裏，“它不再依附于有限的物質對象，不再體現為世俗的人間情感，而首先意味著人與上帝、此岸與彼岸的溝通。”⁸

從這種角度來看，《萬商帝君》中含蓄地保存著陳映真的初期作品以來呈現的重層性基督教宗教性的人物就是林德旺。在這部作品中，在象徵著全球資本主義現世惡的臺灣莫飛穆跨國公司裏，林德旺是一個被徹底邊緣化以後最終悲慘地自我毀滅的人物。因此，林德旺象徵著在基督教裏急切地等待基督教上主的恩寵和救援之手的、貧困、患病、痛苦的鄰居。實際上，

一‘悲劇’，在陳映真逐漸‘覺醒’——逐漸想從一個主觀小說家轉變為客觀的小說家時，越來越清楚地呈現出來。”參見呂正惠，〈從山村小鎮到華盛頓大樓——論陳映真的歷程及其矛盾〉，《文星》1987年106期。

⁶ 參見이재서, <기독교의 이웃 사랑과 그 실천 신학적 의의>, 《신학 지남》69(1)(2002), 310頁。

⁷ 在《舊約》裏，“窮人”的概念是“真正的上帝的百姓或者是強調義之特性的表現法”，指示“因順從上帝的心意過日子，所以在現實上成爲無力並無能之存在的狀態”。因此，這個概念也含有“只有盼望上帝之幫助的謙遜的人”的意義。參見《오픈 II 註釋聖經》(아가페出版社, 1995年版), 1083頁的有關“窮人”項目的註釋。

⁸ 參見楊慧林, 《罪惡與救贖》(東方出版社, 1995年版), 32, 34頁。

在這部作品裏擔當傳播基督教福音的使者作用的Rita首次登場的場面中，圍繞著她送給林德旺的福音單張的《聖經》裏的宗教信息，“凡勞苦背重擔的人，到我這裏來”（馬11:28），是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

“Rita，”他說，“陳經理問起來，說我去辦事。”

“嗯。”

“還有，Rita，”他說：“凡是勞苦背重擔的人……我要得救了。”

“感謝主！”

Rita的眼睛亮了起來。奇妙的救恩！她目送著林德旺像個乖順的小孩般走出辦公室。全辦公室，大約只有Rita以她的基督教的慈愛和一顆慈母的心腸，不明所以，卻確然地感覺到林德旺內心深處隱藏著不可言說的悲傷、重壓和傷害——奇妙的救恩……⁹

當然，這部作品中作者給這個林德旺賦予的人物性格是同情和諷刺混合的立體型形象。他把Rita送給他的福音單張都整齊地收在“右首第一個抽屜裏”，卻把其中向“凡勞苦背重擔的人”的耶穌的召喚解釋為孟子所說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人物形象，於是就聯想到“必先勞其筋骨苦其心志”¹⁰的一句話。換言之，在基督徒Rita的眼中，林德旺是渴望神的救援之手的受傷的、絕望的鄰居。但林德旺本人以為上天為了讓他承擔大任而鍛鍊自己。其實，這個場面，在這部作品的矛盾結構以及宗教性主題意識的體現上，是複雜的意義重疊的部分。

首先林德旺的意識中想起來的這段儒家經典的句子，被用來排解或掩蓋自己在這家企業內部的困境和異化狀況的，一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從而產生把這個人物裏存在的悲劇性傷感大幅增加的作用。在這家公司中，林德旺現在所處的狀況是愚蠢無能、多餘無用的人員。更何況，他在這個激烈、如履薄冰般刻薄的跨國企業中，在冷酷的、野心勃勃的營業部經理陳家齊手下像奴隸一般聽從趨勢，也是由於他個人的生存本能和考慮利害得失的選擇。在今後正要展開的新的經營戰略的兩個競爭人物陳家齊和劉金福之間，林德旺打算積極參與陳家齊的一方，並要得到認同。但是，陳家齊徹底看不起林德旺，公然地指責他的無能。而林德旺卻將陳家齊的這種侮辱，誤認為是為了要鍛鍊自己晉升經理而故意給別人看的，由此可見林德旺的無能和愚蠢。但這其實也是他自己對迫切處境的本能性反應和想擺脫困境的必死的掙扎。最終，像陳家齊對自己的懷疑和斥責一樣，林德旺慢慢地被迫陷入精神病發作的黑暗泥潭。

那麼，通過這種人物性格的設定，作者關於儒教的禮教道德和統治理念，以及與此有關的家族關係和現世價值觀等，要傳達怎樣的信息呢？在此，首先林德旺所接受的為了大任的苦難的忍受，可以解釋為為了從屬於儒家價值終極理想的“治國平天下”的規定而進行的，一種個體人格修養的邏輯。¹¹不僅如此，如果將這種儒家的價值觀聯係到近代資本主義體制的話，可以說是對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或在其延長綫上模式的國家社會的自我認同的行為準則。如此看來，懷著進入跨國企業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幻想來表白“我要得救了”的林德旺，和將它接受為基督教的靈魂救贖告白的基督徒Rita之間的對話，就呈現出諷刺性錯位的效果。

當然，在此考慮到近代產業革命以後新教徒倫理和禁慾主義的召命意識和拯救論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動力的馬克斯·韋伯的理論，這部作品中全球資本主義的跨國企業內部的

⁹ 以下在本文裏引用的《萬商帝君》版本是，《萬商帝君：陳映真小說集4》（洪範書店，2001年版）。

¹⁰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孟子：告子下》。

¹¹ 關於這種儒家價值體系在近現代革命話語的繼承關係以及其理論展開的特徵，參見劉小楓，《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70頁。

矛盾結構，不能說是與基督教的宗教範疇完全無關的。¹²從這個角度來看，通過這部作品中林德旺的人物設定作者要提出的問題意識，也許就是對與傳統儒家思想有關的儒教禮教和家族關係，以及與此有關的在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之下的過度競爭體制和志向成功的價值觀，同時在現有基督教會裏存在的，新教倫理的變質和世俗化現象等的多層次批評。從這個意義來說，林德旺把自己的人生目標與認同于這個跨國公司，由此下決心要與自己農村出身的背景和家庭關係斷絕。通過下面的一個關鍵性段落，就能感受到作家對這個人物的同情和批判。

如果要他離開臺灣莫飛穆，他寧願一頭從七樓栽下這宮殿一般巍峨的華盛頓大樓。冷氣、地毯，漂亮的辦公桌椅，漂亮的人們……這全是“成功”和“出世”的象徵啊。他躲在廁所裏，一個人流淚，一個人安慰自己，一個人笑。他下定決心成功。離開臺灣莫飛穆，他再也沒有更好的機會和鄉下的父母那種粗鄙、辛苦的生活一刀切個兩斷。¹³

當然，這裏要指出的是，這個人物的成長背景，例如農村經濟的衰退、前近代的禮教倫理和家族的解體、惡劣的教育、文化環境等，是讓林德旺執着於刻薄的城市的重要原因。這也是要充分考慮的事項。特別是由於家境窮困不得不小小年紀就爲了還債去債權人家當養子，在暴力的壓抑和孤獨中度過的童年時代的精神創傷，尤其是，爲了家庭生計、照顧弟弟和支付醫療費而犧牲自己的姐姐素香的存在以及對她的負債意識，都是林德旺沒有回家而留在這個冷漠、孤立無援的大城市，艱難地活下去的決定性因素。

同時，在這裏非常有趣的是，這家跨國公司中最有能力、工作最積極的營業部經理陳家齊，就個人而言，也是被設定為具有儒家傳統家庭的成長背景和價值觀的人物。特別是，作爲上海原籍的外省人，在退役將軍的父親的嚴厲、殘酷的家庭訓導之下成長，經過三年的美國留學後，還是遵從老父的命令回來“報效國家”。對他而言，“他深在的宗族情感和愛國忠黨的心懷”就是讓他忘我地工作的原動力，這是不能忽視的一面。因此，對他的儘管“洋老闆來來去去，也調輪了兩三個”，也還是作爲該公司的“中堅礎石”，“自成一箇凝固的力量”，這樣的評價可以說是與那種儒家的價值觀及家庭關繫有關的結果。¹⁴

總之，考慮到這種複雜的關係網，可以在圍繞這一全球資本主義跨國企業的人物形象的意識形態中，儒家的價值觀和家族關係、道教的民間信仰與生存環境，以及基督教的信仰共同體意識等，形成了多層次的共生關係以及戰略合作和衝突的相關性，擴張並發展了資本主義的現代生命力。在近代化趨勢下的周邊階層，經過家族逐漸解體的同時，其生存的基本權利和可能性被剝奪，直到被疏離、淘汰。這部作品通過對這樣一個“貧窮”的悲劇人物的描寫，來重新深入地回顧當代臺灣社會和其歷史現實。

3. 基督教的愛——“小天使”Rita

這部作品中體現的宗教性，形成其中心軸的基督教的信仰和愛的傳播人物是劉Rita。她是業務經理陳家齊的女秘書。可以說，她是這個曠野般的臺灣國際企業裏，最迫切地需要神的

¹² 參見김은정, 〈현대 자본주의 사회에서 프로테스탄트 신앙회복 필요성 고찰: 막스 베버 사상을 중심으로〉(충신대학교 교육대학원, 2014년도 석사학위논문), 49頁。

¹³ 陳映真, 《萬商帝君》, 141-142頁。

¹⁴ 參見《萬商帝君》, 149-150頁。

救援的林德旺的引導媒介，是福音的使者的角色。

Rita是業務部陳經理的秘書。但她和全公司的秘書不一樣。她從來不打扮，從來不搔首弄姿，嗲聲嗲氣地說話。三十出頭，人卻都稱她為“奧巴桑”。她為人謙和。努力工作，整天跟著幾近於工作偏執狂的陳經理打轉。可她再忙，總是不忘找機會把福音單張送給她覺得急切需要送的人。¹⁵

在第一次介紹Rita這個人物時，她的女性身份和潛在的情欲描寫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這與宗教信仰的本質的愛的內容有關，Rita對神虔誠的愛是超越了人的自然本性的情欲的。首先，在上面的引文中，三十多歲的未婚女性不化妝，別人都叫她“奧巴桑（阿姨）”，這很容易讓人理解為她作為女性缺乏美麗和魅力。但她為人謙和、努力工作，盡心傳教，這也可能是為了彌補她作為女性的魅力缺乏，或是為了讓自己發揮其他潛在能力，無意識滿足復仇欲望。這裏如果擴大解釋的話，她的為信而仰傳教正如尼采所說，“上帝信念背後躲藏著人性的怯弱和萎靡，不敢正視存在的深淵，這種怯弱恰好表明任何價值信念都沒有最終的根據。”¹⁶因為這也可能是那有名的，基督教徒的作為“根本不能做行為角度的復仇的，無力者心中的想象的復仇”的，“奴隸道德系譜”的“仇恨”¹⁷的表現。其實，作家在作品中對她的宗教信仰和容貌的複雜心裏描寫得非常細緻。在作品的後半部，林德旺無故缺勤，她在去林德旺家的路上經過一個鐵路平交道的情景就是一個例子。

公司裏那麼多人，就數林德旺最肯接她的福音單張。每次接過單子，林德旺總是說：

“謝謝。”他的微微下斜的眉毛的笑臉，使他的表情看來有一種善意的無奈。

“帶回去，要看哦。”Rita說。

“看。看的。”他說。

“來做禮拜好嗎？”

“下一次吧，”他總是說，仰著頭笑。“下一次吧。”他說，“Rita，全公司，數你最好了，我看。”

她微笑著，把眼睛收回打字機上。她於是又“嗚嗚、答答”地打起字來。“全公司，數你最好了。”Rita的耳中殘留著林德旺無邪的聲音。但是她知道，所謂最好，是面貌和身材平庸，不施脂粉，不穿花俏、新潮的衣服。但是，感謝主，她想，上主給我這容貌，除了上主，我還討誰的喜愛呢？¹⁸

在這裏，可以確定的是她的宗教信仰和傳教行為與為了使自己擺脫懦弱和缺乏魅力或是對潛在的自卑意識的“想象的復仇”是無關的。她對鄰居的愛超越了自然本性的性愛領域，有向與上帝一體化的仁愛領域發展的可能性。為了完成她的這種對宗教的聖潔的愛，又設定了她成長過程的夥伴而設的人物就是同學瓊。在這部作品中，瓊只出現在Rita的回憶中，而沒有直接出場。但她其實是Rita通過基督教信仰和對鄰居的愛的耶穌的愛直到達到救援的信仰成長的橋梁式人物，或是彌補自我缺乏的想象的化身。

她相信了基督，就是瓊，她少女時代最貼心的朋友，帶領的。瓊的個子高挑，皮膚雖然黑些，但豐潤而細緻。然而黑了一些的瓊的皮膚，使她的大而明媚的眼睛，顯得格外地大而明媚；使她的沃腴的少女的嘴唇，顯得分外地腴沃。瓊的功課好，始終同她輪番拿班上第一名。那時候，瓊是多麼美麗、純潔，在她們相識的那個專租給女

¹⁵ 《萬商帝君》，139頁。

¹⁶ 小楓，《拯救與逍遙（修訂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375頁。

¹⁷ 參見백승영, 『니체 도덕의 계보』(서울대학교 철학사상연구소, 2005年版), 60-61頁。

¹⁸ 《萬商帝君》，212-213頁。

中學生的公寓裏，她們跪在深夜的床邊，親愛地、熱切地、同時向著那位在她們的心中留著葡萄顏色的髮鬚，英俊、憂愁而溫柔、親切的耶穌·基督，切切地傾訴著她們共同的嚮慕。“主啊，哦，我主，求你讓我更愛你，愛你更深……”她聽見瓊殷切地說。那聲音是那樣地溫柔，那樣地婉轉，她不覺睜開眼睛，看見跪在隔壁的瓊，把相握著的自己的雙手，緊緊地靠在她那柔軟而飽滿的胸前。¹⁹

在這些回憶場景中，能夠感受到的女高中生時節的細膩的感情和愛情的氣息，對耶穌基督的神聖的愛慕之情又該怎麼解釋呢？這部分可能是潛在的性愛沖動向宗教性的仁愛階段升華的過程，也就是說，這是從篤實純潔的少女之間的宗教感情中潛在的友情和情欲的混和狀態到向真正的耶穌基督的救援的愛盛化的契機的場面。換句話說，基督教的信仰中的“為了感性對象的本來情感，為了超越其本來狀態的局限”，首先就必須要有高揚“上帝的愛”的過程。²⁰作品中，兩個人上了大學後，經歷了與這些女高中生時期的友情和感性的信仰形態的訣別。進而，這些設定是對這個作品的主題意識之一的真正的基督教的愛、神的救援的恩寵的繼續探索。是“小天使”Rita的挫折與自我尋找的過程。

在作品的第五章，“小天使”的引入部分，描寫了Rita去無故缺勤的林德旺家的情景。鮮紅的小摩托車，像“小天使”一樣，明朗地向周圍傳播快樂的的虔誠的基督徒Rita。但她找到的林德旺的住地，是她不曾看到過“破舊、陰暗，有味的地方”。她從鄰居家的阿姨那兒聽說，林德旺很久以前就開始不分晝夜地大聲自言自語，發瘋了。她在林德旺的房間裏發現牆上、床柱上、窗戶上貼滿了“MANAGER”，下面還有“殷紅的像血一樣的粗線”等字樣的重復標記的報紙招聘廣告的剪報。激烈的競爭和非人道的壓抑的跨國企業中的極端異化終於將這個農村出身的年輕人推向了反常的執著和危機感的漩渦中。當然，這期間警衛和不知情的她看到了根本無法理解的情景。她看到了下面的床的天花板上寫有“帝君太子林德旺繪像”字句的畫。還有一幅畫，畫著一個穿著西服，戴著領帶的年輕人坐在像是“太師椅”的椅子上，畫上寫有像是咒語般的英語“MANAGER”。那一刻，“小天使”Rita陷入了無法抑制的驚慌和悲痛之中。

她把極度仰視的頭垂下來。她的心中充滿著悲楚。她想祈禱。她於是坐直了身，低下了頭。

“哦主，我的上主，哦，主啣……”她喃喃地說。她不知道要說什麼，因為她完全無法理解那只憑著感覺去發現到的，林德旺的整個悲苦的內涵。她的兩相緊握的、祈禱的手在發冷。她的胸口被悶熱的什麼堵著。“哦，主啣，”她呻吟著不住地重復，“我的上主，慈悲的天父……”她想哭，讓淚水洗淨她的悵悶和酸楚，但她只覺得眼熱，淚水卻怎麼也流不出來。“主啊，憐憫我們吧……”她哀求似地說。

她默默地坐在床沿。她聽見嬰兒在隔壁不知道爲了什麼，忿恨地哭著。她知道這是她少有的，沒有交通，不蒙上主垂聽的祈禱。必定有什麼不對。她想，她忽然想起了瓊的話——

“許多世上的苦難，是我們這兒的教會和信徒所完全不理解的。”²¹

雖然她懇切地求，但她的祈禱始終沒有得到回應，她無奈離開了他的家。還有，當她聽到一個趴在樓道的長椅上讀書的鄰家孩子對她說“阿姨，再見！”時，突然流出了眼淚。她以多年來不曾有過的悲痛心情懷念著瓊，一步一步走下陰暗的樓梯。也許陳映真的作品中，給人印象最深刻的這個場面，其實正是這個時期壓抑著作家的時代的危機感和宗教儀式。是作為作家的沈重的責任感投影到雖然善良卻很軟弱的基督徒Rita身上的一個瞬間。這裏通過“小天使”

¹⁹ 《萬商帝君》，210-211頁。

²⁰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修訂本)》，273頁。

²¹ 《萬商帝君》，221頁。

Rita，可以說作家要表現的是“愛人如己”的基督教中蘊含的實存的信仰的決斷，以及為了參與到鄰居的苦難中的宗教信仰體驗的擴張問題。因此，對於沒有得到回應的祈禱，她以沉重的心情走下臺階時，窮鄰居家的小女孩“阿姨再見”的純真問候讓她流下眼淚，可能就是“善良誠實的”她的靈魂通過又一個“小天使”之口聽到的神的安慰和鼓勵的聲音。

4. 現世惡的重擔和解放神學論

這部作品中，瓊只是在Rita的回憶中登場後消失在背景中，可以說這是Rita內在的自然本性的情欲，特別是為了克服作為女性的認同感和缺乏感，還有在負擔原罪的人的自私和傲慢中向宗教性升華的過程。與此同時，有必要確認的是，基督教中的這種升華過程不單純是根據個人的人格修養或道德律的自控，而是根據耶穌基督的自我犧牲，使人受到約束和接受永恆的生命的恩賜，從而擺脫和克服自然本性的情欲的束縛和現世的法則。可以說這個過程就是使徒保羅所說的對於信仰、希望與愛聯係在一起的要求，即“人的愛只有在希望和信仰的形式中才成為承負現世惡的力量，才不為任何自然因素所左右”²²的真理的體現。

那麼，在這個作品中，超越自然性情的性愛的信任、願望的形式中體現的宗教性愛情要承擔“現世惡”是如何規定的呢？因仁愛得到救贖的對象是什麼？對那些過去的課題，留下話題的就是Rita與少女時代感性的友情和信仰的同伴瓊的如下離別場面。

“不要為我擔心。”

瓊安詳地注視著她小心地把眼淚擦拭乾淨。上主一定不是我們只做個什麼好事都不懂，只會問他要棒棒糖的那種乖寶寶，瓊說，許多無神論者都視為滔天的罪行的，教會卻噤默不語……瓊悲感地說：

“許多世上的苦難，是我們這兒的教會和信徒所完全不理解的。”²³

接下來的回憶中，瓊大學輟學，改信天主教成為修女。還有，Rita大學畢業，在莫飛穆跨國企業工作後，去羅馬接受修女教育的瓊，後來從玻利維亞寄來了聖誕卡。之後，兩個人就斷了聯系。最終，作者陳映真的這部作品探討的是對抗基督教的現實世界的邪惡與克服的方向。通常認為，這與大致在二十世紀70年代至二十世紀80年代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的共鳴是有關聯的。也許這個瓊通過西方先進的神學理論接觸到了這種解放神學，如果說瓊在對臺灣現實基督教的保守和封閉性的懷疑與絕望中，走上了天主教神職人員修行的路。那麼與她相比，可以說外貌或知性的成長都“遠遠不及她的”Rita，只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體驗著那些宗教性的愛的實踐。對於這樣的她來說，不是在遙遠的南美第三世界，而是就在自己的周圍的林德旺，正是迫切地需要宗教救援的迷途的小羊羔。還有她那雖然“不明所以”，但“以基督徒的慈愛和一顆慈母的心腸”，對他的“奇妙的救恩”，她是“確然地感覺到”的。

然而，換個角度來看，這個“奇妙的救恩”的對象不僅僅是迷路的、生病的羔羊林德旺，其實是也可能是通過對他的救恩，她自己也一起體驗並擺脫了自我中心性與狹窄的自愛。還有那些遭受貧窮和病痛折磨的鄰居的愛，才可以看成是從個別的自我面對神，到神的宗教性的愛的升華過程。對於瓊留下的話題，“許多世界上的苦難”的理解和體驗，對她來說是自己的信

²²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274頁。

²³ 《萬商帝君》，216頁。

仰的深度和寬度擴展的新的契機和挑戰的。如上所述，她接近林德旺的悲慘現實的痛苦時，祈禱沒有得到回應，她切實地感到了自己信仰的侷限而離開了他的家。這個場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實際上，她看到的在那個貧窮的物質生活環境中，林德旺因失業和異化的壓力，以及壓抑的性欲的沖動和內疚復雜地交織在一起，他的肉體和靈魂已經崩潰了，如下面的引文一樣。

林德旺醒來的時候，天還亮得很。他掀開那條陳舊的羊毛毯子，覺得睡夢中的盜汗把他的週神都弄溼了。他脫下汗衫，揉成一團，慢慢地揩拭著脖子和胸前和背後的汗水，並且不時地把汗衫湊到鼻尖去，深深地嗅著。他脫下內褲，看見了枯乾了的、新夢遺的痕跡。他用褪下的內褲揩拭下體，然後用汗溼的汗衫把內褲包好，丟到床下去。現在，十一月的天光，從不曾關閉的窗口，照著他削瘦、蒼白的裸體。他嗒然地站著，面對著窗戶，偶然用他那看來頹喪的瘦手，在身上的這處和那處抓癢。他的棕黑色的男性，看來悲感而且醜拙，在荒亂的體毛中。累累地下垂著……。²⁴

從這種意義上來看，通過這部作品，作者提出的問題很可能是：為了體現對貧窮的鄰居的真正的基督教的愛，應該“理解”並克服貧困生活的痛苦，實踐相關課題。還有那些問題意識最終將不可避免地與“基督教的愛與階級鬥爭是否能共存？”這樣很尖銳的問題聯系在一起。眾所周知的解放神學論的立場是明確的。根據具有代表性的解放神學論者古鐵雷斯的說法，“如果西方的神學企圖把階級鬥爭的事實用基督教之愛的名分隱瞞的話，解放神學就要把階級鬥爭的現實用基督教的愛消除”的神學運動，因此“基督教式的貧窮是‘與貧窮的人們的紐帶’，是‘對貧窮的抵抗’，這是真正的基督教的愛的意義”。²⁵

從這種解放神學論的視角重新回顧前面的場景，Rita為林德旺祈禱而沒有得到回應，應該解釋為，因為沒能實現真正的主之愛的信仰的義務，“沒有與貧窮的人充分結合”。²⁶ 這樣看來，“她的胸口被悶熱的什麼堵著”的原因，不外是滿足於所謂個體的靈魂救援的祈禱，旁觀現實世界的邪惡的“人的剝削和異化的最終原因”的，一種自我中心之自私的罪意識的疼痛。從這個意義來看，這部作品裏無法給出瓊提出的解放神學論的課題的具體實踐和前景，只能是面臨破滅。因為作品的最後一章中描述的是國際會議的成功舉行、中美建交的新聞，還有把林德旺的發瘋淡化為不過是一個瘋子的滑稽戲的全球企業，而以對這個巨大的實體進行報告文學的形式結束。

當然，這些作品的構圖中，對巨大的全球資本主義化的浪潮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論和立足於唯物史觀的階級革命論的介入餘地是很有限的。正像這部作品的結尾部分提到的中美建交（1979年1月）一樣，歷史已經從現有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束和冷戰體制急劇解體的方向發展。因此，要提出對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重組過程本身的全面批判和顛覆的話語，實際上是很困難的。儘管如此，在這部作品中所體現的，包括臺灣在內的所謂“第三世界”的民眾話語上還是有了新的發展的話，對此可以一窺的部分還是宗教性的一面。它應該是包括解放神學論中提出的貧窮的鄰居的社會經濟格局，同時又超出了那些概念範疇的，從基督教的原罪意識和救援意識之本源來，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表現出來的特徵。

²⁴ 《萬商帝君》，190-191頁。

²⁵ 根據古鐵雷斯的觀點，就是“我們不管個人宗教、道德觀點如何，應該承認階級鬥爭的現實存在於我們的經濟、政治、文化、宗教的所有領域。”古斯塔沃·古鐵雷斯著，성염譯，《해방신학: 역사와 정치와 구원》(분도출판사, 1987年版), 350, 35, 379頁。在此分別轉引自이남섭, <신자유주의 시대 제3세계 50억 대중의 희망: 구스타보 구티에레즈의 《해방신학》 다시 읽기>, 《진보평론》 제19호(2004年春季號), 第196, 197, 198頁。

²⁶ 古斯塔沃·古鐵雷斯著，성염譯，《해방신학: 역사와 정치와 구원》，380-381頁。在此轉引自이남섭, 198頁。

其實，在《萬商帝君》中，陳映真追求的是基督教人道主義範疇內的解放神學論，此後作家一直關注的不是“西方中心的，帝國主義中心的視野”，而是從“民眾的脈絡（context）”到“信仰和實踐”一體化的，是所謂的第三世界的“民眾神學”中的基督教的“民眾共同體”的理想。²⁷立足於這種價值觀，陳映真對當時臺灣的基督教教會的封閉和保守及“世俗化”傾向的批判，也是應得到充分肯定的部分。但儘管如此，令人懷疑的是，他重視的基督教的社會使命的價值論是否仍局限於現實世界的物質貧窮和人道主義的愛的範疇。由此來看，以下的論述就是對陳映真文學的基督教精神具有的那種人與人之間的愛的特點及其局限性提出的一個重要質疑。

其實，基督教從“情欲”內部分解出至純至善的“愛”，正是要建立一種拋棄一切物質形態和物質手段的、超驗的價值體系。就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耶穌才將“愛”立為“最大的誡命”。²⁸

如此看來，以現有的觀點對以往的陳映真文學“基督教信仰與社會主義信念之間的思想的、情感的張力與糾葛”的評價框架的正確性問題，有必要更客觀地重新討論。在此過程中，核心焦點是如何克服對神的存在的根本立場差異的隔閡。也就是說，應該超出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的一個現實代替方案的，這種現世性宗教論的範疇。因此有必要對這部作品內在的基督教的宗教性的本質的回歸，進行重新解釋和批評。

5. 貧窮的宗教性再闡釋

如上分析，讓這部作品的悲劇性中心人物林德旺走向人生的破滅，是因他不幸的成長過程和家庭環境，以跨國企業為象徵的世界性資本主義體制的結構矛盾等綜合因素造成的。可以說，在這些因素中使林德旺個人走向破滅的最直接的決定性因素是精神病。他上高中二年級的時候精神病首次發作，其根本的心理因素是小時候他和鄰居阿倉哥劇烈地爭吵以後經歷過淹死之前對死亡的極度恐懼，以及以後在黑暗裏迷路感到絕望的經驗。換句話說，林德旺得精神病並不僅僅是由於他的農村出身而導致的貧窮的成長環境，之後的養子經歷，以及大專畢業以後在競爭社會生活中遭受的壓迫等物資方面的匱乏和社會經濟上的異化引起的。其根源是人內在的利己的欲望和自我中心的本能引起的爭吵、憎惡、怨恨以及由此引起的對死亡和孤立的絕望的恐懼感，這一點很重要。誇張一點說，使他破滅的精神病與基督教的本質原理即原罪意識有著內在關聯性。在作品中反復出現的、下面的原形體驗的風景描寫就是一個例子。

他在溪邊的一塊大石頭上痴呆似地坐著，然後起身尋著和阿倉哥走來的，印在沙礫和石頭上的足蹤，離開溪埔。那時候，夕陽把整個埔上的光芒，一概染成金黃的顏色。可一走上黃土坡地，天就逐漸地暗了下來。原來深綠色的，在風中婆娑著的相思樹林，現在卻變成了一幢幢黑色的、遼闊的樹影。就在那時候，他曾覺得所有來過河將去的路，他全不認得了。在越來越暗的天色裏，他的稚少的心中，充滿著從未知道過的焦慮、恐懼和絕望。他在夜色中奔走，向著他所無法確定的方向。這時候全世界似乎只剩下了他驚恐的足音，和自己細小而急促的喘息聲……²⁹

就是這種黑暗中，在這個世界裏孤獨地經歷陌生和黑暗中的絕望，從他第一次精神病發作

²⁷ 陳映真，〈耶穌在窮人中興起新教會〉，《人間》1989年6月號。

²⁸ 楊慧林，《罪惡與救贖》（東方出版社，1995年版），36頁。

²⁹ 《萬商帝君》，178頁。

到此刻在臺北市中心精神病發作的過程中，向他襲來的是“恐怖且混亂的像地獄般的日子”的記憶的反復。換句話說，可以把林德旺的絕望的彷徨解釋為，像因為人類的原罪從伊甸園裏驅逐出來的亞當和夏娃的兒子該隱和亞伯一樣，由於兄弟之間的怨恨和罪惡而受處罰流放到能聽到血聲的土地的象徵性。如下反復出現的詛咒的噩夢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這樣的夢，算不算“固定”呢？他想。他於是又想起這樣的夢：他忿怒地——也不知為了什麼，總之，他便是那麼樣地、異常生氣地在故鄉銅鑼的、乾涸的河床上奔跑。河床上的石頭堅硬、棘腳，被太陽曬得火燙。每次他的腳趾踢到石頭，都使他痛澈心肺。“啊唷喂我X你娘咧！”他夢中罵著。但他還是那麼生氣而執念地跑著，一心要跑出荒蕪的、看似無邊的故鄉的河床。然而，整個河床卻只像輪盤一般，慢慢地轉動，使他耗盡力氣，就是怎麼也無法逃脫整個惡意而熬熱的、荒亂，而又令他羞恥的河床。³⁰

在這個場面中描繪的噩夢般的“江岸”，這部作品的主人公林德旺在成長過程中面臨的現實世界裏的各種難關的原形，可以把它解釋為受到神的處罰，驅逐到“伊甸”東邊“挪得之地”的“該隱的心理現實”。³¹那是只依靠人類的力量和意志，再怎麼努力也無法擺脫的、不知深淺的黑暗的深淵。陳光興對這部作品中描寫的，林德旺的精神病發作，解釋為“讓許多所謂的精神病患都難免會閃過自殺的念頭，有些最後走向死亡的絕路尋求肉身的解脫”的“難以承擔的痛”。³²林德旺再也無路可走，成了在絕望中渴望神的救援之手的真正的“貧窮的鄰居”。

然而，對於這個問題，作家陳映真與其說是從對那些宗教的罪意識和救援的角度，不如說是從對現實歷史課題的社會主義信念的實踐和挑戰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的。在《萬商帝君》以後的後期創作的，發表在“歷史時期”的，對臺灣馬克思主義者們悲劇的鬥爭生活、民族分裂的社會現實的殘酷的社會壓迫結構的探索，從反面證明了這一點。這些作品中，通過對在苦難的逆境中堅持政治信念和鬥爭生活的人的描寫，或是經歷了日本殖民地時期、內戰時期和分斷時期，為了個人的榮華富貴和生存而維繫毀滅性的惡魔本性的人的批判性描寫，可以說作者陳映真最終追求的是人類現實社會歷史中的生存及其矛盾結構和民族自我的認同。

那麼，在這個創作過程中，他的作家意識內在的基督教的宗教性又是以怎樣體現或變形的呢？他這一時期的創作中，如《山路》（1983）或《趙南棟》（1987）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她們的自我犧牲的同志愛或家族愛，或融入鬥爭現實中的母愛的人性的擴展中，是完全可以類推到耶穌基督或聖母瑪麗亞的形象的。但在這個過程中貫穿了歷史現實，將個人的本性與宗教信仰的問題聯系在一起，追求立體描寫的作家意識反而淡化了，這是事實。可以說，他的後期創作是基督教的信仰和社會主義信念之間的緊張和矛盾逐漸向馬克思主義一體化的世俗化轉變的過程。因此，如果從這種陳映真的作家意識與基督教話語的第三世界民眾的神學角度分析，可以說作品的結尾部分，以林德旺所表現出的一個瘋子的滑稽劇式的終結的瘋狂的抵抗就是作家反映批判現實的意識及絕望感的結果。

不知道那裏來的神力，那男子奮力掙脫眾人，兇狠地站立著。他的雙眼，閃爍著某種憤怒、驚惶混合起來的清冷的目光。

“我萬商帝君爺有旨啊……”他說，掀開破舊的西裝，露出污穢的黃襯衫。襯衫上寫著血紅的、斗大的英文字：MANAGER。“你們四海通商，不得壞人風俗，誑人財貨喂……”他唱歌也似地說。

³⁰ 《萬商帝君》，194頁。

³¹ 參見劉驥鳴，〈魯迅的兄弟題材創作與“諧隱殺弟”〉，《東方叢刊》，2008年4期。

³² 陳光興從以精神病為母體的陳映真文學具有“第三世界文學”這一特點的視角，評述這部《萬商帝君》從深層次描寫了“第三世界前殖民地國家於二十世紀70-80年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精神（崩潰）史”，並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參見陳光興，〈陳映真的第三世界：狂人/瘋子/精神病篇〉，《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260，264頁。

“啊！林德旺！”

陳家齊的叫聲。

“德旺！”陳家齊怒聲喝叫，“不要胡來！”

說來神奇，聽到陳家齊的聲音，那男子頓時像綿羊似地，馴服地讓門警和飯店經理押走。³³

在這裏，林德旺借《萬商帝君》這一道教的民間信仰的力量發泄自己的壓抑心理和強迫觀念的場面，顯然是與對客觀現實的認識和冷靜的自我反省相距甚遠的。這些只能解釋為他為了解決現實問題的一種祈福信仰的迷信或是自我欺騙的幻想性精神錯亂現象。還有，被陳家齊這個要將“盲目的民族主義”的“惡魔的毒牙”拔除淨盡的跨國企業新“全球經理”³⁴趕出去的溫順的林德旺，無疑就是“從‘華盛頓大廈’這個當代鐵屋”裏“被丟出來的、瘋出來的”犧牲羔羊。從這個意義看來，這部作品無疑是“全無出路”、“前路封死的”、“抵抗主體的問題意識與信念上失重而落”的故事。³⁵

但儘管如此，從《萬商帝君》的主題意識體現為宗教性的角度看，作品的結局也並非是毫無出路的完全絕望的結局。相反，這部作品中由於現實世界邪惡的勝利而遇到的絕望崩潰，可能意味著真正的基督教宗教性將要體現的新的出發點。同時，如果以這種視角回顧作品的矛盾結構，就會看到，除了對林德旺進行基督教傳教和伸出仁愛之手的Rita之外，還有犧牲自己的青春為了家庭，特別是為了有天賦的弟弟而進入民間宗教的道教廟宇“三界宮”去做“女乩童”的姐姐素香。因此，需要解決的課題或問題就是他克服與姐姐素香的分裂，恢復與農村家庭的紐帶。這是因為，為了弟弟而選擇不幸人生的姐姐的忠告，即“花草若離了土，”“就要枯黃”這種話，至少指出了從跨國企業的國際化、近代化表面裏潛在的結構性矛盾和不道德脫離的，含有愛情的路標。

如此來看，對這最後場面中在瘋狂和迷信裏潛在的基於迫切的生活欲望和恐懼的宗教信仰因素，就可以賦予更積極的意義。首先，將這悲劇性結尾聯係到林德旺在潛意識中回歸到姐姐的民間信仰，即是在陳映真的初期文學裏所體現的“左翼男性”主人公的“與女性、人民的和解”³⁶，這種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主題意識的解釋也可能。另外，通過這部作品中素香、Rita、德旺的宗教信仰來說明“第三世界現代性的構造”的陳興光之分析也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就是說作家通過這種結局顯示出被認為落後迷信的民間宗教，和被認為象徵進步、現代的外來宗教的基督教及天主教之間的糾葛以及其重層聯係性。從這種角度來看，“一旦面臨即將滅頂，被進步的資本主義拋棄的德旺所能調動的存活資源，還是那個屬於自己都認為是迷信的帝君”的指摘頗有意思。³⁷

從另一面看，也可以說《萬上帝君》的這種獨特的最後場面暗示著在臺灣或現代中國的社會歷史中為了基督教信仰真正體現的實踐課題，以及在多元性語言文化環境中為了基督教話語擴張其宗教真理的方向。³⁸同時，如從這種“重層性信仰結構”的同時代性意義來再闡釋這部

³³ 《萬商帝君》，235頁。

³⁴ 《萬商帝君》，251-252頁。

³⁵ 參見趙剛，《左眼臺灣：重讀陳映真》，153，156，160頁。

³⁶ 與此有關的觀點，參見趙剛，《左眼臺灣：重讀陳映真》，39頁“（二）自我改造尋找出路：與女性、與人民和解”小節。

³⁷ 參見陳光興，〈陳映真的第三世界：狂人/瘋子/精神病篇〉，《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263頁。

³⁸ 特別是與解放神學論有關的作家陳映真，曾特地對韓國的基督教表示過關注和共鳴。在此，既有韓國的基督教研究中做出的如下分析，可以得到很多啟示。“薩滿教仍然起著韓國人的宗教感性的母體而

作品的結局的話，不管作家陳映真對資本主義現實體制的批判意識和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意識怎樣，應該說，這個部分就關涉到包括作家自己在內的臺灣之宗教現象，進而對深層的中國人的家族關係以及民族國家意識的再解釋的課題。³⁹

總之，用壓制著這部作品的悲劇性人物林德旺的對死亡和絕望的恐懼，以及以“Manager”來象徵的現代性欲望和怨恨來塑造出來的，叫做“萬商帝君”之偶像的宗教性含義不限于1980年代初臺灣的特定時空。因為這部作品中提出的全球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糾葛結構，以及在這種現實歷史的曲折中展開的民族國家之間的政治、宗教、文化的紛爭和對決，就在進入21世紀的至今依然不斷惡化，也是事實。如此來看，這部作品中能找出的基督教話語的核心，不就是對那種黑暗現實世界之統治勢力的終究性勝利和審判的信息的呢。其實，如將這種現世之惡能命名為魔鬼的話，基督教聖經中由耶穌基督所宣佈的，也正是以消滅那種魔鬼來臨到的天國的福音。

我若靠著上帝的靈趕鬼，這就是上帝的國臨到你們了。（太十二：28）⁴⁰

6. 結語

關於現代中國文學中體現的與基督教的影響關係，自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是中國學界活躍討論和研究的課題。但超越對表現基督教題材或使用聖經的隱喻和語言的作品或作家的關注，對與宗教的本質相關的文學的宗教性的有深度的論述，至今還不夠充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分斷體制下臺灣當代文學的代表作家陳映真的小說中體現的基督教話語性質的分析，是富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正如本文中討論的，陳映真的文學世界中，基督教與其說是對包括個人內在的空虛和存在的不安的救援的信仰，不如說是立足於耶穌基督的自我犧牲式的鄰居的愛的宗教精神的、為了國家和民族、社會底層貧窮的人們實現正義而實踐的宗教。由此可以感到，尤其是他的早期作品中那種宗教信仰未能在現實生活中實踐的一種負罪感中的苦難意識和懺悔意識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陳映真的基督教精神是對中國的現實歷史中臺灣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和現實惡的批判和反抗，同時也獲得了社會主義政權成立以來，對大陸社會主義革命的肯定與自我認同的文學形象化。

當然，在當代臺灣的代表性進步左翼作家陳映真的文學世界中，基督教的宗教性超越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社會體制的框架或大陸和臺灣的現實空間的分斷，包含了宗教的本源性苦

運行，佛教發揮驚人的融合能力並包容民間信仰而變為強大。……雖然現今的韓國的佛教、基督教等世界性宗教具有強大的勢力，但是沒有一個宗教掌握著主導權，韓國仍是多種宗教共存的社會。韓國人不管宗教種類，都有與民間信仰的原始感性及儒教倫理觀有關的重層性信仰結構。” 류대영, 《한국 근현대사와 기독교》(푸른역사, 2009年版), 186頁。

³⁹ 另外，這種悲慘的作品結局也可闡釋為陳映真的下意識裏潛在的一種家族自卑感與對基督教信仰的愛憎錯綜複雜地反映著的結果。與此有關的，關於作家陳映真對生父陳炎興、養父陳根旺之親之日行爲的嫌惡以及針對父親地位的否定心理，就產生了陳映真的“叛離教會”和“叛離父親”之一種“弑父”儀式的看法，參見陳明成，〈陳映真現象：關於陳映真的家族書寫及其國族認同〉（前衛出版社，2013年版），129-130頁。

⁴⁰ 《新舊約全書》（香港聖經公會，1961年版），16頁。

難意識和救援意識。但在現實的冷戰體制時期的資本主義文化圈中，對現實批判和解放神學論的正當性的共鳴，是否還停留在世俗神學話語的範疇裏呢？其實，他對這種資本主義體制之矛盾的基督教人道主義觀點的批判性作家意識，在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被用作是顯示後現代性中華霸權主義或大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正當性和相對優越性的一種戰略工具，恐怕是很難完全排除的。⁴¹而這種結果或許帶有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民族國家話語共存這一疑難問題上關涉到20世紀中國的整體文化結構的矛盾衝突的性格。因此，只要基督教摸索干預到現實歷史以及民族國家的改變和矛盾解決的話，它就是在文化話語領域上不能完全擺脫其束縛的、充分顯示出中國特徵和局限的例子。

儘管如此，不可否定的是，在陳映真的作家生涯和文學世界中，基督教信仰和社會主義理念不是相互排他性的對立的價值，而是具有旨在克服和超越對現實歷史的結構性矛盾的“彼岸的革命”話語的嘗試的意義。本文討論的他的創作前期與後期之間的分水嶺位置的中篇小說《萬商帝君》，就是作家陳映真用獨有的“曲扭的鏡子”⁴²來有深度映照了分斷體制下現代臺灣的現實和靈魂的，現代中國文學基督教話語的折射與世俗化的重要成果。⁴³

⁴¹ 關於中國大陸中堅女流作家王安憶的小說《烏托邦詩篇》中出現的，臺灣作家陳映真的基督教宗教性的共鳴和其文學史意義，可以參見拙稿〈王安憶的虛無意識和宗教性：以《烏托邦詩篇》為例〉，《中國語文論叢》23集（中國語文研究會，2002年）。

⁴² 對陳映真的關於臺灣基督教會的批判性提議，尤其是對“世俗化的教會”現狀的嚴峻的指摘，可參見陳映真等著，康來新、彭海瑩合編，《曲扭的鏡子——關於臺灣基督教會的若干隨想》（雅歌出版社，1987年版）。

⁴³ 參見《萬商帝君》，149-150頁。